

百年重大考古纪实书系
何尚/主编

龙山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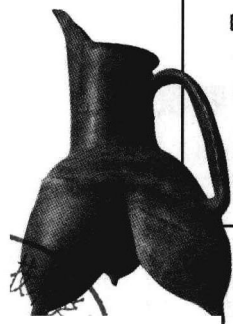
大家出版社

百年重大考古纪实书系 何尚 主编

龙山春秋

石舒波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山春秋/石舒波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 - 7 - 5347 - 4991 - 9

(百年重大考古纪实书系/何尚主编)

I. 龙... II. 石... III. 龙山文化—研究

IV. K871.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0985 号

龙山春秋

石舒波著

责任编辑 管 昕

责任校对 李建平

封面设计 刘 & 王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 电话:0371—63863551

制 版 郑州普瑞印刷制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94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二环支路 35 号

邮政编码 450012

电话 (0371)63955319

目 录

引子 安特生和他的“西来说” 007

在水一方 019

齐鲁大学 东平陵 城子崖 傅大炮

清华国学研究院 史语所 龙骨

梦萦济南 珍珠泉 山东古迹研究会

横空出世 045

大东 锄头说话 新闻发布会

兵发龙山镇 龙山之夜

秋风萧瑟城子崖

“提炼宝贝”与“披葱式” 子夜吴歌

卜骨卜骨 蛋壳黑陶 行行复行行

又见龙山 071

小屯故事 从后冈出发 重返城子崖

大风起兮云飞扬 城墙的诉说

神秘的红烧土 骨器石器蚌器铜器

陶片陶器陶系陶文 光荣与梦想

灵光再现 091

众里寻它千百度 旧地寻梦
出师未捷 夯土基槽 04 探坑
井的发现 水落石出

阳关三叠 103

昨夜星辰 鹭生莲花 丁公陶文
景阳冈

龙山时代 113

泰山一脉 高耸的城墙 六畜兴旺
火的艺术 中华第一乐章
二十四节气 铜石并用时代

英雄传说 139

皇皇史书 三皇五帝 人文初祖
赤县神州 东夷部族 尧舜禅让
神医扁鹊 后羿射日 大禹治水
少昊之国

高山流水 167

吉金宝鼎 风萧萧兮易水寒

山左有光 傅孟真与李济之

结语 走近城子崖 179

跋 187



引子 安特生和他的“西来说”

黄河跃过三门峡，就如同狂奔的野马被套上了缰绳，在仰天长啸、横冲直撞中脚步渐行渐缓，仿佛不经意间，在身后甩下了一片沃野千里的豫西大平原。

1921年4月18日，一个偶然闯入的外国人，让豫西平原上一个名叫仰韶的小村庄激动得如同过大年一般。好奇的村民争先恐后地拥向村头，观赏这位深目高鼻、相貌怪异的“洋鬼子”。

有几个胆大的孩子，不知从哪里拖来一根长长的木棍，躲藏在“洋鬼子”的身后，想寻机戳一戳他那个出类拔萃的大鼻子，看看是不是如大人们所说，是“用蜡烛的眼泪和面做成的”。

洋人手里拿着几件谁也说不出名堂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嘴里说着些叽里呱啦谁也听不清楚的语言；比比画画地向村民打听一个好像是十分奇妙的去处，或者是一种非常珍贵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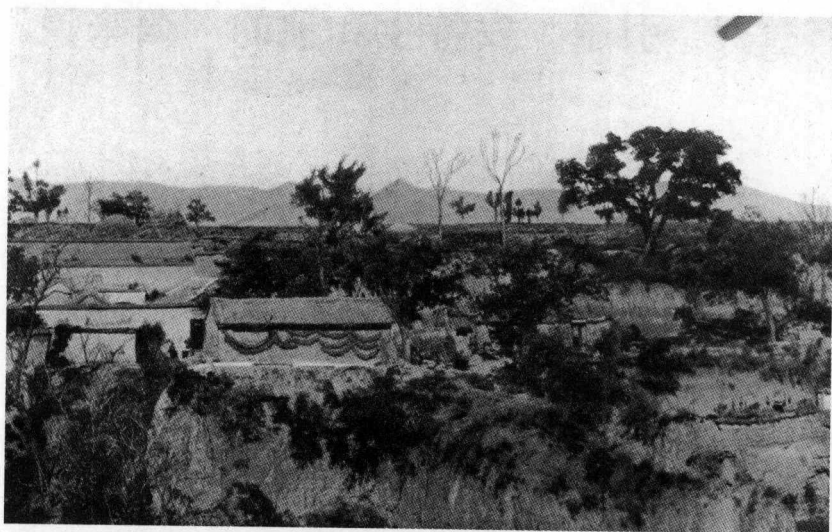
好奇的村民围绕着他，仔细地打量，傻傻地憨笑，暂时忘却了饥肠辘辘的愁苦和衣不遮体的窘迫。

在被村民观赏的同时，洋人也在不失时机地打量这些黄河的子孙：他们的相貌，与脚下的黄土一样平淡无奇；他们的笑容，清澈透明，如同巴颜喀拉山上黄河源头的小溪一样潺潺流淌，不染纤尘。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在北京的中国同事，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杰出领导者——丁文江和翁文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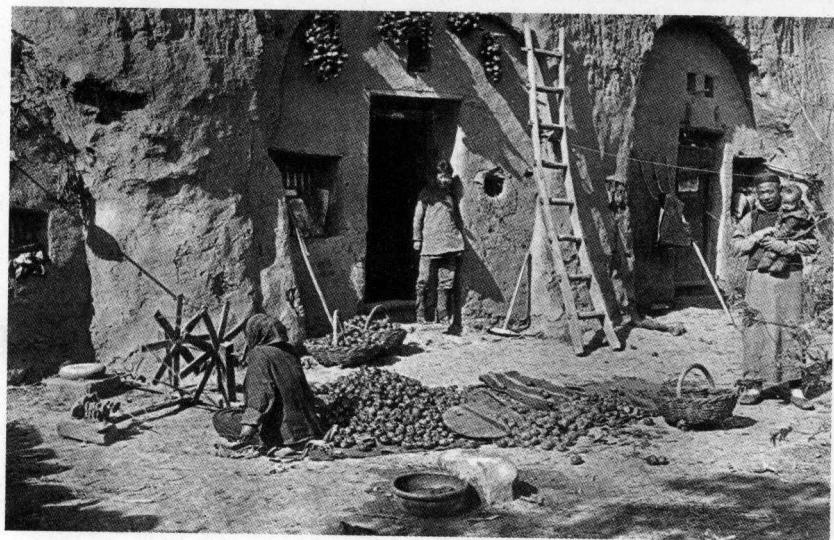
“是的，他们是同一类型的人，哪怕是目不识丁的村夫或博学的文士，都是一样的。”他在心里默默自语。

终于，在他反复比画和助手的耐心演示下，热情的村民总算弄明白

仰韶村的黄土沟壑（安特生摄）（左页）



仰韶村（安特生摄）



仰韶村的窑洞（安特生摄）

了他的意思：他要寻找的是一些破瓷烂瓦和埋有这些破烂东西的地方。

如此一来，围绕着他的仰韶村的男女老少越发大笑不止：既为这洋人的愚蠢和荒唐，也为全村人终于解开了一道难题而得意。

于是，他很快就被好客的村民簇拥着来到了目的地——村子的南头，一道被河水冲刷出来的幽深峡谷。

对于这次令人难忘的经历，这位洋人十几年后在他所著的《黄土的儿女》一书中做了详尽的记录：

在村南约一公里处，我要经过一个深谷，一个真正的小峡谷。这个峡谷是后来我们对此处地形调查中著名的一部分。我到深谷北边后，在一条沟渠边上看到有一段非常重要。沟底红色的第三纪泥土显露着，它清晰地被一层满含灰土和陶片的特有的松土覆盖着，可以肯定这是石器时代的堆积。搜索了几分钟，于堆积底层发现了一小块红陶片，其美丽磨光的表面上为黑色的彩绘……我感到这类陶器会与石工具在一起发现是不可思议的。

我感到有点失望，认为走的这条路把我引入了歧途，我想还是回到地质古生物学研究上较为稳妥……

其时，夜里躺在床上还思考着仰韶村这个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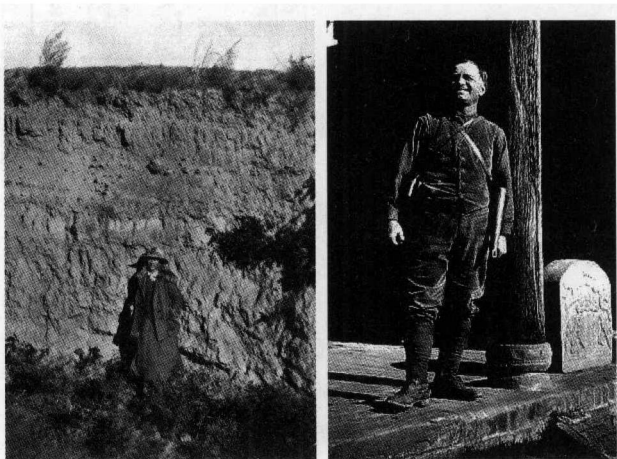
我决定用一天的时间去探索那个峡谷壁……考察了几小时后，我从没有动过的灰土中得到一件精致的石镞。这天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物品，很快就清楚了我必须在这里研究这些非同寻常的重要堆积、丰富的遗物，特别是容器碎片，包括我上面提到的美丽的磨光彩陶。

这位令人迷惑不解，而又自鸣得意的洋人来自万里之遥的瑞典，名叫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从1914年到1925年，他应邀担任中国北洋政府的矿政顾问，在广泛进行矿物调查的同时，进行古代生物和文物方面的调查和采集工作。十几年间，他的足迹遍及中华大地，并以对中国文化的多方面研究而成为名扬西方学术界的“中国通”。

安特生是一位富于冒险和献身精神的地质学家。他出生于瑞典的克尼斯塔，或许是地处北欧寒冷地带的家园激发了他探索的激情与灵感，

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狂热地爱上了冰川探险，并多次深入神秘的北极和南极地区，历经磨难，九死一生。探险生涯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也为他赢得了事业上的声望。1906年，32

仰韶遗址的文化堆积层
(左)
安特生在河南进行考古
调查时留影(右)



岁的安特生出任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并在地质科学的多个领域里卓有建树。

安特生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学者和探险家对东方进行空前探索的时代，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他们的足迹遍及整个东方世界。西方国家的“远征军”和传教士源源不断带回的财宝和关于东方的传说，令遥远的东方世界顿生神话般的魅力与色彩。身为学者的安特生，对东方世界的向往之情，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与日俱增。

机会终于来了。

1914年3月，他幸运地接到了来自神秘的东方世界的邀请：中国政府通过瑞典国政府聘请他担任中国农商部的矿政顾问，协助中国专家进行地质和矿物方面的调查。

安特生欣喜若狂，立即启程前往中国。他当时并未料到，这次机遇所导致的一系列“新发现”，将为他带来巨大的国际声誉；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次东方之旅完全得益于一位未曾谋面的中国“伯乐”的大力举荐，而这一切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当时的中国，清政权已被推翻，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为北洋军阀所攫取，“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仍留居宫中，继续享受满清遗老遗少们的顶礼膜拜和民国政府的种种“优待”。北洋政权四面楚歌，朝不保夕，地位岌岌可危。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政府，却做出了一项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明智之举的决定：为了搞清国内的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炭资源的情况，从欧洲发达国家聘请一位地质专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地质矿藏方面的全面调查，以便进行开发和利用。



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为
安特生颁发的护照

消息传出，在中国境内享有治外法权的所有西方列强，立刻精神亢奋地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力图独揽“调查”大权，以便利用这种名正言顺的方式，摸清中国的资源“家底”，从而攫取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但出人意料的是，中国政府却宣布，不从英、美、法、德、日、意、俄等西方大国中选择专家顾问，而是选择由北欧的瑞典人来担当此任。

这一决策是采纳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建议的结果。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是中国现代地质科学的开创者。早在1916年，他就倡导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质调查所，并担任首任所长，为推

动地质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培养训练地质科学专门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

丁文江推荐安特生来华的理由是,瑞典是西方国家中有较少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与其他列强相比,在历史上对中国的侵害较小,因而用瑞典人显得较为“安全”。

这一建议遂被中国政府采纳。

来到中国的安特生立即被委任为中国政府农商部(后相继改称农矿部、实业部和經濟部)的矿政顾问,职责是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和煤矿。

尽管当时的中国战乱频仍,政局动荡,寻矿及采矿的工作举步维艰,但安特生很快就发现,贫穷的中国却是一座有待科学发掘的“金矿”。在那些人迹罕至的荒山僻岭,在那些鸡鸣犬吠的贫穷村落,到处都有等待发掘的无尽宝藏。他向丁文江提出了结合地质调查,合作采集古代生物化石的计划,采集的化石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瑞典的几家博物馆分别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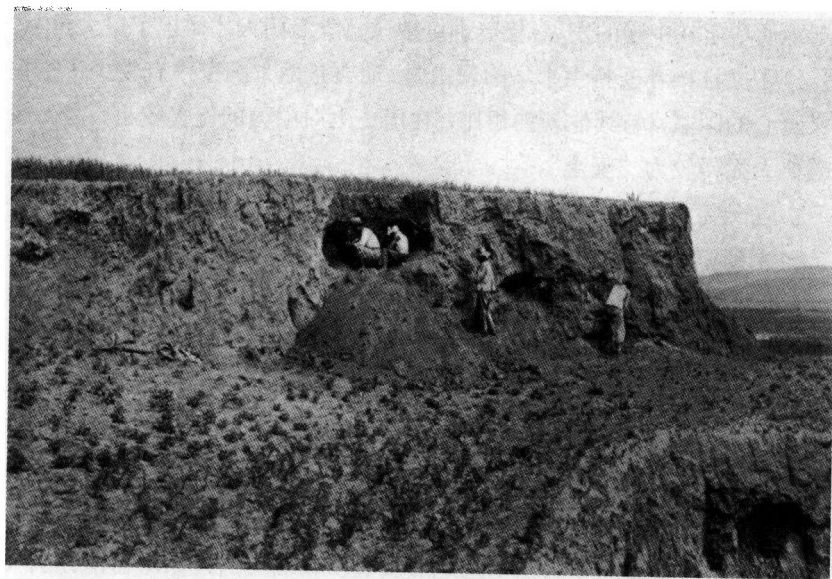
这一计划很快就得到批准并付诸实施。

1934年,已经功成名就的安特生,在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郊外的别墅里,幸福地回忆起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幸运之旅,他写道:

一系列幸运的环境使我几次成为开拓者。1914年,我是第一次偶然发现基质岩有机物起源的人。1918年,我发现了 *Collenia* 瘤状体并认识到它与北美寒武纪前期相似的“化石”的联系。同年,我们在中国发现了第一个 *Hipparion* 田野,在科学界很有名。1919年,在蒙古的 *Ertemte* 发现了海狸动物群。1921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发现了仰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及黄河第三纪之始新世的哺乳动物。奉天沙锅屯洞穴堆积和在周口店发现更著名的洞穴堆积,这些闻名于世的发现是由继我们之后的人工作的结果。

在中国的土地上,安特生实现了人生的梦想,并将自己的科学探险事业推向了巅峰。

安特生有幸“偶然”发现了仰韶史前文化遗址,但却并未立刻认识到它所蕴含的真正意义。由于出土的彩陶片上的黑红彩纹饰过于精美,竟使他一度产生“如此美丽的陶片决不会是史前时期的产物”的想法。他不敢相信,如此精美的艺术品竟会出自尚未开化的“史前人类”之手。直到从仰韶回到北京后,在地质调查所的图书馆里,他仔细阅读了美国



地质学家庞帕莱在俄属土耳其斯坦安诺的考古发掘报告，才认识到那些美妙绝伦的彩陶片可能确实是史前时代的产物。

安特生把这一发现告诉了他的中国朋友丁文江，并得到了丁文江的帮助。于是，在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中国地质调查所和河南省、浚县两级地方政府的积极协助之下，安特生重返仰韶，与袁复礼、师丹斯基等人一起，从1921年10月27日开始，在仰韶村进行了长达30天的考古发掘，把一种崭新的彩陶文化昭示于世，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发现，标志着现代田野考古已经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中国，开花结果。仰韶文化的发现，不仅使中国没有石器时代的谎言不攻自破，而且也寻找中国文化的来源开辟了新的道路。

20世纪初的中外史学界，正是“中国文化西来说”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存在石器时代的说法，因为缺乏考古学上的实物证据，被一概否定，中国远古文明的历史传说，被斥为“无稽之谈”，中国文明的古老源头，被不约而同地引向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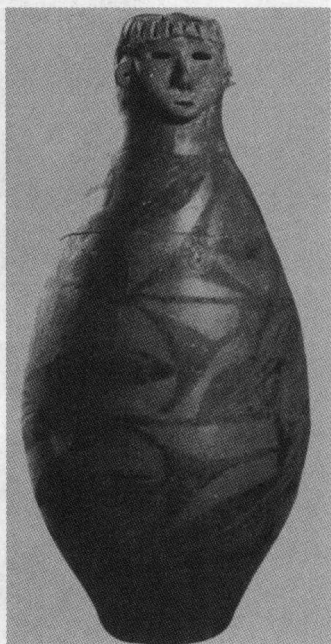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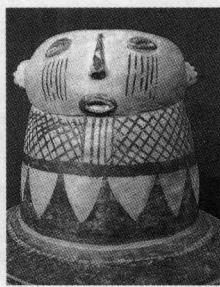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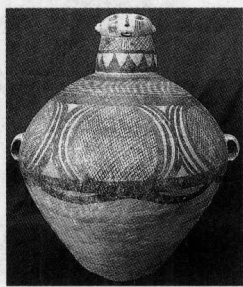
早在17世纪中叶，德国耶稣会教士基尔什尔就提出了“中国文明来自埃及”的假说，并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

荷兰莱顿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忽恩在17世纪提出的中国人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该隐的后代的荒诞之谈，居然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一

仰韶文物——人首彩陶器（左）
 仰韶文物——彩陶人首壶（中）
 仰韶文物——人首彩陶盆（右）



仰韶文物——人首彩陶罐（左）
 仰韶文物——人首彩陶罐细部（中）
 仰韶文物——人首彩陶瓶（右）



直被堂而皇之地论证为千真万确的“史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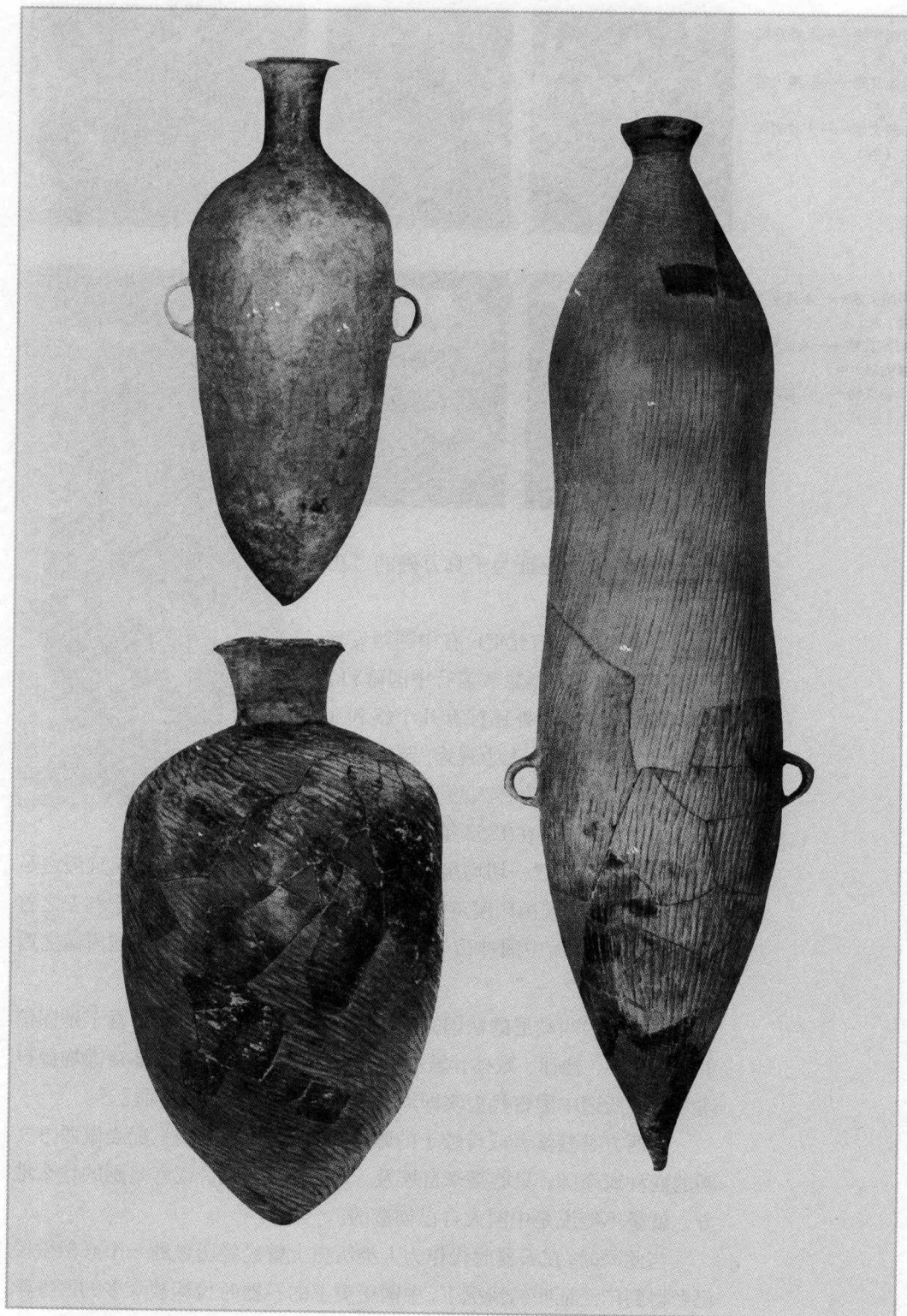
1625年(明天启五年),在中国西安郊区发现的名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石碑,因在汉字之外还标有几个叙利亚字母,也被某些西方人士视为“至宝”,并作为中国文化由西方传入的证据。

法国人哥比诺在1853年著文宣称中国文化来自印度:“一切均足以证明《摩奴法典》所言无误,而且因之足以证明中国文化实由印度英雄时代后一种民族——即由白色雅利安之首陀罗人传入之。而中国神话中之盘古实即此印度民族迁入中国河南之酋长,或诸酋长之一。”

另一位名叫歧尼的法国人则认为中国文化源于埃及:“吾于是深信中国之文字、法律、政体、君主,甚至于政府中大臣及全部帝国均源自埃及。而所谓中国古代史实即埃及史,弁诸中国史之首而已。”

在西方某些学者或传教士的眼里,古老的中国文明只配当做西方文明的变种或余脉,只能是来自埃及、印度、巴比伦,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就是不能说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

与此同时,在石器时代作为人类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一个必然阶段已经得到广泛证明的情况下,中国历史上的石器时代却被众多的西方学



者以证据不足为由否决掉。

20世纪初的西方学术界几乎众口一词,一致否认中国历史上有过石器时代,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史界先贤虽然先验地意识到中国历史上一定有过石器时代,但因研究方法的局限,而不能提供有力的证据。美国学者劳弗尔宣称:“中国石器时亦见之,但甚鲜少,中国从未有石器存积一处……故据现代所知者言之,不能谓有中国石器时代。更从典籍考之,尤无所谓中国人之石器时代也。”西方人士的一孔之见,甚至得到许多中国学者的随声附和。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轩辕氏、神农氏用石头制造工具的记载,也有肃慎氏使用石弩及历代发现“雷斧”的传说。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发现过石器,但因为认识的局限性,并且由于这些石器多属零星采集而来,缺乏必要的地层依据,所以它们未被看做中国文化的产物。

安特生在仰韶遗址发掘的大量与彩陶共存的石器证明,与世界的其他地区一样,石器文化也是“汉族”人曾经经历过的文化阶段,从而使“中国没有石器时代”的说法不攻自破。安特生首先注意到,仰韶遗址出土的陶鼎与北京街头所售的砂锅相似,而仰韶遗址出土的陶杯的形状,与北京紫禁城美术馆陈列的汉代铜杯如出一辙。尤其令他感到惊奇的是,仰韶遗址出土的陶鬲与中国周代的铜鬲,在外形上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区别,甚至就连周代金文中“鬲”字的写法,都是直接临摹陶鬲或铜鬲的形状而来。

所有这一切都提醒安特生,“自仰韶器物形状观之,则全似为汉族遗迹”,仰韶文化即是“早期中国人的文化”。

安特生独具慧眼,发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石器时代,使世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但遗憾的是,在对这种“早期中国人的文化”来源的认识上,他也未能免俗,情不自禁地重犯了一个许多西方人士都犯过的错误,即将中国文化的起源引向中国以外的西方。

1923年,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对仰韶文化与中亚地区的安诺文化和特里波列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提出了彩陶文化是由西方传播而来的看法,他说:“仰韶陶器中,尚有一部分或与西方文化具有关系者,近与俄属土耳其斯坦相通,远或与欧洲有关。施彩色而磨光之陶器即其要证。”又说,“与此相似之陶器,欧洲新石器时代或其末期亦有之,如意大利西西里岛之启龙尼亚、东欧之格雷西亚、俄国西南之脱里波留、俄属土耳其斯坦之安诺等地方,皆曾发现。各处之器,各

仰韶文物(安特生摄)
(左页)

有特点，然与河南仰韶古器之器工花纹，皆有相似之点。夫花纹式样，固未必不能独立创作，彼此不相连属，然以河南与安诺之器相较，其同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出于同源之感想。”他认为，“吾人就考古学上证之，亦谓此著彩之陶器，当由西东来非由东西去也。使他日可证明制陶器之来自西方，则其他文化或种族之特性，亦可由此输入……因仰韶遗址之发现，使中国文化西来说又复有希望以事实证明之。”

关于中国文化由西而来的途径，安特生作了这样的假设：

由地理环境上之分析，确示新疆为吾人最后解决仰韶问题之地也。因吾人于此可以识别一种蒙古利亚民族当新石器时代曾受西方文化之影响，亦或受西方人种之影响，生息繁衍，渐至务农。文明因而大进，是为中国历史上文化之始。但就河南采集所得，颇觉此种文化之行程，实可由中亚细亚经南山及北山间之孔道东南而达于黄河河谷，以至现代之兰州……自西方远来之新文化，当其先达黄河流域之际，影响传播极为迅速，顷刻逐流而下，以至黄河之支流，遂与原有土著之文化相混合。

安特生的看法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一种以彩陶和红铜为代表的先进农业文明，由西方进入中国的黄河流域，汇入原有的土著文化并成为中国的史前文化。而那支先进的文化代表，当然是长头颅或短头颅的白色日耳曼人种。

公允地讲，安特生不是一个心怀偏见的人。科学研究所需要的道德良知，使他力求客观地运用已有的考古材料。但是，由于研究方法和考古材料的局限，由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强烈暗示，更由于一种西方文化至上的潜意识，他自以为是地得出了中国的彩陶文化是由西方传播而来的错误结论。

随后，为了给彩陶文化自西而来的假说寻找更多的证据，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又用数年的时间在中国的陕、甘、豫西等地进行了更加广泛的考古调查，并



安特生在瑞典东方博物馆的办公室